

冯可汉 著

民族革命斗争史
近代云南少数民族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冯可汉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9

ISBN 7-5367-2038-6

I. 近... II. 冯... III. 少数民族-革命史-云南-
1840~1950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218 号

责任编辑:岳灵玉

装帧设计:早 南

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

冯可汉 著

*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字数:210 千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6.00 元

序

中共云南民族学院委员会副书记 罗开云

云南是我国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省有 26 个民族,15 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独有民族,16 个民族为跨境而居的民族与缅甸、老挝、越南山水相连,与东南亚、南亚相邻,是我国西南边防门户,战略地十分重要。云南各民族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参与了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缔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祖国西南边疆的开发都作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云南各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至 1950 年云南全境获得解放的 110 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自由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谱写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1840 年至 1950 年,是云南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云南人民先后遭受了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一百余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云南发生过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杜文秀、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片马抗英斗争,发生过河口、腾越起义、重九起义、护国首义等推翻帝制再造共和的英雄壮举。马列主义

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迅速成立,领导和开展了学生运动、工农群众运动,卓有成效地领导和开展了武装斗争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在云南这片红色热土上卷起了拯救中华民族,抗击法西斯强盗的抗日战争浪潮。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争和平、争自由、争民主的“一二·一”“七·一五”怒涛,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开辟了武装斗争根据地,推动了昆明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大军南下的声势浩大的进军声中,解放了云南全境,赢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本书作者冯可汉同志在教学工作中与我共事多年,彼此相处甚为融洽。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数年前就蓄志将百年来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迹写成专著的打算,并写出了写作提纲,反复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为配合课堂教学向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深入的爱国爱家乡传统教育的好事,我在与作者交谈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意见,尽可能地给予鼓励和支持。作者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大量资料,在省内外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几经寒暑,终究完成了这本专著。蒙作者信任,首先送我阅读,纵览全书,我认为本书翔实地记述了百余年间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革命史实。避免了面面俱到、平铺直述地写一个个的历史事件,而是集中突出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边疆的、民族的特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体是少数民族人民,但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爱国民族上层人士的斗争,也有较为全面的记述,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为人民、为国家做过好事的民族上层、民主人士,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精神。

作者记述的每个重大事件,力求做到有一个全面的描述,事件首尾相顾、人物面貌清晰。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的来龙去脉都有

个清楚的交代。作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给广大青年朋友提供一本具有浓郁乡土、民族气息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教材。在史料的应用上恪守严谨真实的原则,行文上十分注意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力求做到了通晓流畅,读来朴实无华、感情真挚。应该说,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对近现代云南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如杜文秀、岑毓英、杨玉科、张文光、龙云、卢汉等),作者本着“人物阶段论”的原则,作了论述,结论性的文字并不多,这给读者留有思索的余地,一些人物的评价还应该从多方面展开讨论。

阅读本书,给我较深刻的感受是作者在大量占有史料、忠于史实的基础上,饱含热情地讴歌了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作者满怀激情地去再现民族英雄们那一幕幕悲壮辉煌的历史,让读者透过逝去的苍茫的时代风烟,去缅怀英雄们那感天动地的人格伟力,从中得到了催人奋发上进的力量。抗战历史是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最撼人心魄的重要篇章,为此,作者着墨较多,篇幅也较大,其他如中法战争与云南,班洪事件、辛亥腾越起义、建党初期云南地方党的艰苦奋斗、红军长征过云南等部分也占一定分量。对抗战期间“驼峰”航线的开辟、中美两国人民用鲜血凝结起来的真诚友谊也热情地给予颂扬。

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博大丰厚,在一本篇幅不太大的书里当然不可能得到较全面的记述,我也感到本书因为重点是史实的描述,但理论的升华还显得比较单薄。

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当前,全社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目的在于使全省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真正了解我们云南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我们党和人民的光辉业绩和光荣革命传统,从而弘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动员和激励

全省各族人民为富民兴滇而奋斗,《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的出版,无疑将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弘扬云南各族人民百年来用鲜血铸就的爱国爱家乡的民族之魂让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热爱云南,起着可贵的积极作用。我愿向广大青年朋友们推荐这本书,故乐为之序。

目 录

前言	(1)
鸦片战争后的云南社会	(5)
滇西大理杜文秀回民起义	(8)
哀牢山李文学彝族起义	(19)
马嘉理事件,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开端	(29)
血雨腥风片马抗英	(37)
刀光剑影战班洪	
——班洪事件佤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47)
中法战争在云南	(62)
辛亥风雷震边疆熔炉铸就英雄魂	
——辛亥革命在云南	(73)
革命星火燎云岭	(95)
金沙水拍云崖暖	
——红军长征过云南	(123)
民族之魂系滇云	(159)
云岭欢歌	
——云南人民的彻底解放	(223)
后记	(258)

前 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为了救亡图存，许多志士仁人艰苦求索、寻找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真理和道路。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

云南各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自1840年起到1950年云南全境获得解放的110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自由和幸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在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10年间，云南发生过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杜文秀起义、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收回七府矿权的斗争、片马抗英斗争，发生过河口、腾越起义、重九起义、护国首义等推翻帝制、再造共和的英雄壮举。演出了一幕幕悲壮慷慨、哀乐凄戚的历史活剧，这些斗争，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全国和云南人民的这些此起彼伏、连续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妄想，但是，一切没有代表各族人民利益政党领导的斗争最终都归于失败，中国人民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云南各族人民经过漫长的艰辛求索，和全国人民一道终于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自1926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创建至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最终迎来了胜利，迎了解放。

19世纪前半期，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日益腐朽，而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商品输出来打开中国的门户。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商品的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就利用鸦片来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罪恶手段。鸦片的主要产地是英殖民地印度。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鸦片由印度经缅甸走私输入十分容易，云南就成为鸦片流毒十分猖獗，受害最为严重的一个省。在清代中叶嘉庆、道光时期，鸦片在云南各阶层中已经习染成风，大小官吏无不吸烟。走私猖獗，贿赂公行，吏治腐败。曾任迤西道员彭毓松记载：“署中厮役多滇人，虽好贫无裤，不烟无以为活也。”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折中提到，一次缉获走私烟土就达20 000两。马克思当时曾说：“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吏完全腐化。”^①1840年这历史上黑沉沉的年代，英吉利帝国的铁甲战舰，轰破了虎门炮台，《南京条约》记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随之开始了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的进程。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夺取殖民地，远东成为他们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中国的邻邦朝鲜、越南、缅甸，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与越南、缅甸山水相连的云南受到了最直接的威胁，英、法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美丽富饶神奇的红土高原，他们无休无止、野蛮凶残的侵略行径，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

的民族灾难，也激起了云南人民强烈的民族仇恨，反帝斗争的烈火燃遍了祖国南疆的这片红土地，争权益、保疆土、求生存，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南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翻开这一页页充满血泪、悲壮的历史，这本小册子将向您展示那不能忘怀的情景：1875年蛮允边寨的刀光剑影、英国侵略者马嘉理自取灭亡，蛮允、雪列景颇儿女严惩顽敌的壮举、扑朔迷离的“马嘉理案”（滇案），使大清帝国倍受耻辱的《烟台条约》的签订。1888年镇南关外的炮声、云南军民与法国侵略者浴血奋战、捷报频传、全国振奋、清王朝“以胜求和”的丑剧，迎来的却是又一个“奇怪的”不平等条约。边疆又燃起了新的斗争烽火，片马、班洪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前赴后继。滇越铁路，七府矿权的丧失，为争回路权、矿权而斗争。洋教的侵略活动，无孔不入，法国侵略者在省城的胡作非为、百姓众怒难平、火烧天主堂。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深受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压迫之苦。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都异常尖锐，正如在1905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接见云南留学生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以致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辱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之压榨与外辱之欺凌下，易于鼓动奋起。”^②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所给英国的赔款大宗的鸦片消耗，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溢，外国竞争对地方生产破坏的影响，全部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这些情形引起了两种结果：旧捐税更加繁重而难以负担；旧捐税之外又加上新捐税。”^③云南的情况正是这样。清朝云南地方财政，一向入不敷出，年年仰仗外省的协助，即所谓“协饷”。鸦片战争后，不但“协饷”停止，云南还要分担战争赔款白银30万两，相当于全省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云南官府于是增加捐税，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以致云南成为全国赋税最重的两省之一（另一省为江西）。政治经济日益恶化，农村贫困，矿业凋蔽，全省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不断发生，这些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其中逐渐聚集成两支宏大的巨流，一支是以杜文秀为首的滇西各族人民起义，一支是以李文学为首的哀牢山各族人民的起义：“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人民反封建的英勇斗争虽然大都失败了，但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却将永远标榜史册，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

1926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建立。直接领导了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1934~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过云南，直接在云南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极贫极弱的云南不仅出兵20余万，支援了全国抗战，滇省各族健儿血洒中原。1942年以后成了抗日前线的云南还取得了滇西抗战的巨大胜利，创造了号称人类奇迹的滇缅公路的修筑，云南人民感到骄傲。飞越死亡禁区的“驼峰航线”的开辟，又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永恒的桥梁，从抗日战争至“一二·一”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武装斗争，到云南和平解放近百年云南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一样，进一步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救中国。这应该是本书的简单结论。

注释：

①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

②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恩全集》第九卷第111页。

鸦片战争后的云南社会

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深重的社会危机，在边省云南以更加尖锐形式表现出来，巨额的赔款，庞大的军费，统治阶级的挥霍滥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齐加到各族人民头上。从1840年到1851年，云南地方政府，为了镇压人民，先后用兵18次，仅林则徐办永昌地区回汉仇杀案就费银40万两，而当时全省一年财政收入只有70万两。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剥削，高利贷者敲骨吸髓的盘剥。在滇西大理地区“人口繁重，生计日艰，至于农产物，则菽麦稻粱不能敷食。”^①省会昆明地区，由于1847~1848年农业连续两年歉收，致使“粮价增昂，民食殊形短缺。”^②当时的云南是：“土地贫瘠，输转艰难。征税之纷繁，供应之冗杂，胥吏之苛扰，将弁之撻越有求于它省之十一而不可得者。”^③

铜矿等冶金业，曾经是云南社会经济的一大支柱，其重要性仅次于农业。云南铜矿业在经历了清乾隆年间极盛时期后，嘉庆年间开始衰落，产量急剧下降。道光初年，情况恶化，到咸丰、同治年间，“京运每况愈下，寻致停办数十年”^④当时全省矿工在十万以上，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和破产农民。铜矿业的衰落使大批矿工失业。被清朝地方官污为“游匪”“厂匪”。“民失养则为匪”大批失业矿工走上了“官逼民反”的道路。在矿业衰败的同时，农业也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破坏了。租赋差役繁重，再加上商业高利贷的盘剥，农民失去了土地、贫困破产，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在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是这样。“永北

厅属北腾土司所管夷地典卖折准为汉民者，有典出十之七八者，有典出十之三四者，夷人无田可耕。”^⑤滇南石屏的“龙棚海东称沃壤，半属临近右族”^⑥滇东北昭通地区的土地兼并与石屏、临安一样严重。农村凋敝，农民难以活命，当时有一首诗《田家行》写到：“风吹墙茅声萧萧，黄犬逐鸡飞过屋。新妇炊厨无粟，阿婆怒、小姑哭，阿翁坐枵腹，丁男出为佣，生儿弃不育，典取身上衣，杀我田中犊，尽力耕田岁不熟，更兼官府催科促。君不见，城中大家厌梁肉，村下小民死沟渎。”^⑦农民在官府、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陷于死亡的绝境。

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便积极推行“以夷制夷”，和“以汉制夷”的反动民族政策，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挑拨离间，竭力制造隔阂和纠纷，甚至利用汉回民族间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的不同，散布所谓“回子狡猾”“回子无好人”的谬论，其结果，民族间的不和，特别是汉回民族间的流血冲突，群众性的械斗仇杀事件越演越烈。在云南社会矛盾激化的条件下，清王朝却变本加厉的施行民族屠杀和压迫政策，提出“制回必先治匪，匪不治，则回不治，汉亦不治”妄图以“治匪”来达到治回治汉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云南地方官采取“慎选文武，责成公当保甲以清内匪，团练以御外匪，各路严巡卡，以杜匪之往来，各厂严簿籍，以防匪之出入”^⑧等措施。以清王朝的愿望相反，这些防范和镇压措施，完全无法防止根源于日益深化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上的反抗斗争的发展。呈现的依然是，“滇省匪式骄横，厂匪川匪勾结愈多，肆行掳掠，贼焰日张，抗官殃民”的情景。民族矛盾在激化，阶级搏斗在发展，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就要来了！

注释：

- ①《大理县志稿》6卷第17页。
- ②《新撰云南通志》第161卷第23页。
- ③《滇系》艺文第二册第79页。
- ④《新撰云南通志》农务考，田制。
- ⑤《石屏县志》卷32艺文附录13。
- ⑥《回民起义》第一册第169页。
- ⑦《回民起义》第一册第169页。
- ⑧《回民起义》第一册第170页。

滇西大理杜文秀回民起义

19世纪中叶，农民革命的风暴席卷全中国。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太平天国革命爆发，革命烈火从广西迅速燃烧全国，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云南各族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云南的汉回地主商人，因兼并土地，争夺矿权和商权，便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并多次挑起汉回群众间的械斗和仇杀，鸦片战争后，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斗争更为加剧。清王朝利用民族矛盾，推行“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的反动民族政策，故意不断制造“回汉互斗”事件，回族人民惨遭屠杀，其中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缅宁（今临沧）惨案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永昌（今保山）惨案”，被残酷杀害的无辜回民就在万人以上。咸丰六年（1856年）冲突进一步扩大，楚雄一带无家可归的回民逃往昆明，云南巡抚舒兴阿和藩司青盛密令屠杀全省回民，令各州府县“剿灭滇回八百里”“准许各地对回民‘格杀勿论’”。昆明回民首当其冲，仅4月16日被残杀回民近两万人，几无遗类”“各府州县闻风踵起”，掀起“灭回狂潮”。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各地回民纷纷奋起反抗，其中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赵洲（今凤仪）马敏功、马如龙、马德兴起于临安（今建水）；马临汉起于昆明，杨震起于昆明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庆余起于河西（今通海），马连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马小老、马鸿轩起于宜良。各地起义回民军不久汇合成两大支，一支以杜文秀为首，活动在云南西部；一支以马德兴、马连升、马如龙、马荣为首，活

动在滇南和滇东。

滇南和滇东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一开始就掌握在回族上层分子的手中，马德兴是伊斯兰教首领，到过麦加朝圣，马如龙是滇南回族豪绅，马连升和马荣是滇东豪强。滇东力量比滇南力量单薄，马连升和马荣常依附马德兴和马如龙。这些人并没有领导回民坚持斗争的思想，各有自己的打算，咸丰十一年（1861年），马如龙率众包围昆明，次年接受清廷“招抚”，被授“总兵”官职，马德兴被封为“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马连升授“代理总兵”、马荣求得“参将”头衔。昆明实际上控制在他们手里，降清后，他们妄图纠合各地回军割据云南。清王朝新任云贵总督潘铎不满马德兴、马荣的专横难制，趁马如龙领兵外出之机，企图消灭他们的势力，同治二年（1863年）春，事机泄露，马德兴急调马荣率一股回军入昆明，诛杀总督潘铎，马德兴自行护理总督。不久马如龙率军回昆明，逐走了马荣，掌握了更多的实权。清廷授其云南提督衔，马如龙成了清王朝的凶恶鹰犬，镇压云南各族人民的刽子手。马连升和马荣在清军和杜文秀军之间投机，反复无常，被清王朝擒拿处死。

杜文秀（1823～1872），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省永昌府保山县人，杜家世代赶马经商“家资殷实”。曾考中秀才，擅长文墨。在1845年的永昌屠回事件中，杜文秀的亲属中多人被杀害，未婚妻被知州恒文的家丁掳去。他与同族丁灿庭上北京告状，经林则徐到滇处理，冤案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反，但田产被人吞食，清王朝不但不“秉公处理”，反将虎口余生的200多户“难回”分起押送前往当时有名的瘴毒之区一怒江坝的官乃山区，冤屈未得昭雪反给同胞招致横祸，回民受迫害的状况几乎毫无改变，他不得不离开原籍，往来于永平、大理、蒙化一带，秘密联络回民中的有识之士积极进行反清起义的准备。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大理官绅奉命“灭回”，杜文

秀、马金保、马朝珍等人即率蒙赵起义军驰援大理回民，趁提督文祥出军姚州（今姚安）之际，攻占了滇西重镇大理。十月，杜文秀被大理各部民族义军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起了大理农民革命政权。杜文秀封授了蔡发春、蓝金喜、马天有、马朝珍等大批文武官职，大理义军旗帜尚白，史称“白旗”。大理政权建立后，打出了“救民伐暴”的旗帜，“遥奉太平天国之号召，革命满清，”公开宣布了政治纲领“联回汉为一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①提出了“杀官安民”“安汉反清”的口号，开始进行了历时 18 年的不屈不挠的反封建革命斗争。杜文秀及其战友们，对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满怀信心，1862 年杜文秀说：“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揆诸时势，差堪自信。”^②1869 年大理义军东征昆明，杜文秀说要“收复全滇”。表示“全滇不取，亿兆难安”表明了杜文秀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统治的决心。杜文秀大理政权最为人称颂的是所实行的联汉联彝的民族团结政策。杜文秀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懂得“汉回互斗起于细微，实由永昌文武官弁云南大吏酿成屠杀之惨祸，而殃及全省。咎多在官，而不在民。”基于这种认识，大理政权教育回族人民要正确对待汉族，团结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对敌。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民族间的仇杀，改善汉回民族关系。大理政权提出的“联回汉为一体”的主张在实践中得到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杜文秀指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必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少，必须重用汉人。”^③杜文秀的主张，在 1861 年颁布的《管理军政条例》得到了体现，条例规定：“族分三教（按指回族、汉族和其他民族）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④这一政策起到了良好效果。据载，当蔡发春于 1861 年 7 月攻克保山时，谆谆告诫部属：“财、色为挫人志气最毒之物；要图大事，而志在抢掠，亡灭无